

# 一九一八以來之

# 中日關係

賀嶽僧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九一八以來之中日關係

獨立出版社 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初版

九一八以來之中日關係

全一冊實價三十五元整

著 者 賀 嶽 僧

發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重慶江北香國寺上首

印 刷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正 中 書 局

重慶中一路二一〇號

經 售 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二十二號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 序言

這一本書，是用夾敘夾議的體裁寫的，所以，有許多應該留在雜言或結論中說的話，筆者均已於敘述中說過了，基於這一點，因此我就僅把事實記完為止，沒有另作結論了。不過我覺得還有一點簡略的意見，應該在這裏再說明一下，那就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原因，換句話說，即中國於日本的侵略所應負的責任。關於這一點，自然各有各的意見不同，一般的，都是歸咎於日本的侵略成性，我個人的意見，則微有不同，語有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如果大家承認這原則是不錯的話，那末我們在責難日本的侵略暴行中，似乎應該自己加以反省，我們究竟有不有自侮，自伐的行爲呢？

就我個人看來，還是有的。最主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能現代化，工業化。我們知道，日本對中國的大舉侵略，是在明治維新之後，事實上，日本的對外侵略力量，也是到明治維新之後才逐漸長成，以前的對華侵略，不過是海盜式的剽掠行爲而已，這種剽掠行爲，雖然可惡，並不十分可怕的。

明治維新所昭示的意義，在政治上是消滅封建，在經濟上是實行產業革命，在這兩個前提之下，於是日本的國力，始逐漸的強盛起來，形成爲近代的帝國主義，於是才有在韓

論的提出，於是才繼之有中日與中俄兩次戰爭的勝利，中國以堂堂上國的資格，竟在甲午一役中一敗塗地者，乃是由於不能及早完成統一，發展建設的原故。而後來的北洋政府，又在此錯誤的基礎之上，更把國力消耗於內爭，甚至借助於日本的力量以進行鬪爭之爭，因此遂使日本的侵略力量，更加度的深入中國，造成九一八以後這場禍天的大禍，這是我們於厲行抗戰建國的今日，所以痛自反省，審察其致病之源之所在，而力自糾正，然後抗戰建國事業，才有早日完成的希望。

其次，關於本書的撰述體例，還有幾點須要向讀者說明的。

(一) 這本書不是一本專門的著作，所以凡是稍微涉及專門性的問題，如法律條文的解釋，經濟上的統計數字，如不十分必要，均極力避免引用敘述，以求節省篇幅。

(二) 用文字來敘述一件事物，也同用顏料來作幅圖畫一樣，有工筆與寫意之分，一花一木，一草一石，如果用工筆寫，那是一件夠繁複的事，如果照寫意的畫法，那祇簡單的幾筆，勾出一個輪廓便夠了，筆者寫這本書的手法，是後者而不是前者，不過雖然如此，但仍力求其輪廓之不走樣。請讀者在這一角度來對本書作批評，不要從另一角度來看。

(三) 本書的範圍牽涉甚廣，而筆者寫這本書時，乃是在參考書不十分充分的環境之下，因此有些應該敘述的事，或不及遺漏，好在與這同樣性質的書，坊間已發行得很多，

事實上讀者如果要對中日關係作深刻的認識，單看一本書也是不夠的，如祇求明瞭其概略情形，則本書或可負擔這任務。

(四) 本書第五章之敘述，大部份是根據何應欽先生的著作，那一章的第四節，則是用重慶大公報的轉輯，特此聲明。

(五) 筆者寫這本書的動機，是受盧速曾先生的囑咐，而在寫作時，又承獨立出版社同文的幫助，可惜的，是本人的學識文劣，有負盧先生與諸同文的囑咐與幫助的盛意，這是使我於寫成時，所覺得到感慚交併的一件事。

以上就算是序言。

# 目次

## 序言

### 第一章

歷代中日關係述略

#### 第一節

引言

#### 第二節

明以前之中日關係

#### 第三節

明代倭寇

#### 第四節

中日通商到甲午之役

#### 第五節

二十一條與兩次魯案

### 第二章

九一人事變

#### 第一節

促成事變發生的原因

#### 第二節

九一人事變經過

#### 第三節

偽滿洲國建立後之東北

目

次

一  
一  
一  
七  
四  
二  
三  
三  
一  
一  
一  
四  
七

527636/11

第三章

九一八事變擴大與延長

五四

第一節

一二八淞滬之役

五四

第二節

熱河長城冀察之戰

六一

第三節

綏遠戰役

六六

第四章

九一八後之中日外交

七〇

第一節

日本退出國聯以前之中日外交

七〇

第二節

日退盟後之中日外交

七八

第三節

七七以後之中日外交

八五

第五章

五年來之抗戰經過

九六

第一節

盧溝橋事變至南京撤守

九六

第二節

南京撤守至武漢淪陷

一〇五

第三節

武漢淪陷至太平洋大戰爆發

一一二

第四節

太平洋大戰後之一年

一二一

第五節

抗戰以來日寇的政治經濟外交侵略

一三六

## 第一章 歷代中日關係述略

### 第一節 引言

歷史的進行，宛如一捲永遠放不完的長影片，在這影片中，後一事件，往往不過是前一事件的繼續與延長，雖然其中也有段落的可尋，但故事畢竟是整體的，不能截然劃分。因此我們爲要更清楚的證明九一八事變以後的中日關係起見，則對於這以前的中日關係，也不能不述一個輪廓。

### 第二節 明以前之中日關係

倭人的初通中國，始於東漢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即公元五七年，以後凡附註公元年號者，僅書數字，「公元」與「年」三字從略）是年倭奴國遣使來朝，使人自稱大夫，光武帝賜以印綬，文曰「漢委奴國王」，這是中日發生關係的開始。不過當時他還是一種未開化的民族，根本就沒有國家的組織，其遣使前來朝貢者，不過是現在日本南部那一羣人中的酋長而已。故在宋以前的中國歷史上，是沒有日本這一個名詞，祇有「東夷」，「倭奴」，「倭國」等稱呼。

### 歷代中日關係述略

嗣是以後，他便時常遣使前來朝貢，終魏晉六朝，始終未常間斷。當時藩屬各國之向中國朝貢者，最富有一種打秋風的性質，那些使臣之前來中國的，往往攜帶一些其自國所產的物品，要藉中國皇帝以表示敬意，中國皇帝，則照例的須回敬他們以更豐厚的賞賜，使他們多落得一點實惠。此種情形，試舉魏景初二年（二三八）十二月，所頒倭女王卑呼的詔書即可證之，詔云：

制詔親魏倭女王卑呼，帶方太守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三匹二丈已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裝封，付帶方太守授汝；汝其綏撫種人，勉爲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爲率善中郎將，牛利爲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引兒勞賜遣還，奉以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縵衆罽十張，舊絳五十四，紺青五十四，各汝所獻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綿三匹，細班罽五張，白綿五十四，金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白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紫封付難升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人，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也。（三國志魏書東夷傳）

從這文書中，我們可以知道，這次倭女王所貢的，是男五口，女六口，班布三四二丈，而所得的，則如此豐富，故後來歷仁德，履中，允恭，安原，雄略各王朝，均陸續的

有人向中國來稱臣納貢，到宋順帝昇平二年（四七八），且詔封其國王武爲「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從東漢起一直到此時爲止，他對中國始終極端恭順的。

隋室初年，他還是照例前來進貢方物，以藩屬自居。可是到煬帝大業三年（六〇七），其國王遣使來朝時，却在文書上表示一種驕傲的態度，竟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煬帝看了，大不高興，比卽對他的侍臣說，此後「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次年卽遣使赴倭，對他這種無禮的態度加以申斥，倭王亦自知不合，對使臣的待過，特別恭順，表示歉意，這才了結此一事件。

自東漢以歷隋朝，中國與日本的交通，約有四百五十年的歷史，在這四百五十年中，雖然彼此的往來未嘗斷絕，但關係畢竟還不十分密切。一直到唐朝以後，才使其關係更進一步的加深。所謂加深者，並不限於往來的次數增多而已，更重要的，乃是由於往來次數的增多，遂使中國的文化在這時期中開始輸入日本，同時由印度所傳遞到中國的佛學也在這時期中爲日本所接受，現在我們試從唐人所留下的詩文集中，卽可以發見很多與日人唱和往來的詩歌文字，而武后時的日本使臣粟田，與開元時的日使仲滿，尤以通曉中國文學，爲當時朝野名流所推重。粟田以好學能屬文，其態度又雍容儒雅之故，曾受武后的寵，賜宴於麟德殿。仲滿則因愛慕中國文化。遂留華達五十餘年，仕唐室爲左散騎常侍安

南都護等官，後遂終老於中國。從此以後，中國經典，便逐漸傳入日本，而日本亦不斷的遣派子弟，留學中國，故現在的日本文字，大部分都是從中國抄去而按其方言稍加變化的。這是中國文化對於日本的進步有極大關係的一件事。同時他因為通中國文義的原故，才覺得倭字的意義不好，改稱日本。然而在這時期中，中日的衝突，亦復開始接觸，這是由於高麗問題所引起的。原來唐室的聲威，遠播域外，現在的朝鮮半島，當時悉入唐室版圖。然其時朝鮮內部尚未統一，三國鼎立，時起爭端，高宗龍朔三年（六六三）唐室派兵前往平亂，其中有一位失敗的王子，遂勾同日本派兵援助以圖抵抗，於是日本援軍，便與唐室的遠征軍發生衝突，結果日軍為唐將劉仁軌、孫仁師大敗於白江（錦江口），這才阻住了他的勢力，不敢向陸上發展。

日本的文化，經過了唐代幾百年的陶冶後，已逐漸的進步，而佛教尤成爲當時彼國朝野上下一種極普遍的信仰。故在北宋初年，日使之前來中國者，大抵爲佛教徒。其著稱者，在太宗雍熙元年，有旡然與其弟子多人，在真宗景德元年（一〇〇四），則有寂照等八人，神宗時，又有誠尋，仲向先後來華。不過這些來華的僧徒，並不是日本正式的僧臣，他們來華的目的，與其說是代表國家來通兩國的和好，毋寧說是屬個人游歷與參觀的性質而已。可是有一事值得注意的，就是那些來華的僧人，都深通中國文字，而且寫得很好的中國文章。據齋藤所述，當時日本國內，已有中國的儒學與佛學經典，並有唐易

的詩文集等書，後來他回國時，復取去了鄭康成所注孝經及唐太子越王貞所注孝經新義，還有一部更大的佛教叢書大藏經，於此可見，日本文化的開發，完全是得力於中國的幫助。

宋室南渡以後，以建都地點的遷移，東南沿海一帶逐漸發達，而對外貿易事業亦極繁盛，其時日本商人，漸有至中國沿海各地往來貿易者。此種商人，多於貿易的場所，設立綱首，其職務類似於現在的領事官，遇有滋擾不法者，則中國官廳，常將犯事者扭解其綱首處理。開有為風潮所擊毀的商船，飄泊至中國沿岸無以為歸者，則中國官廳必設法收容賑濟，直至資遣其回籍而後止。

從大體上說，從東漢起以迄南宋止，中國與日本的往來，是保持着和平的關係。但至元朝初年，即開始進入到惡劣的階段。起先是至元五年（一二六八），世祖忽必烈的兵力達到高麗後，即遣使詔諭日本，招其前來朝貢。這一件事，元室起初是派高麗王代做的，當時日本還不知道遼宋室已被蒙古滅亡，故對於高麗所代行傳達元室詔諭不加理會，而這時蒙古威力，已震耀世界，自然不能容許這最爾小國的抗命。於是乃於翌年起，又先後遣使的，殷宏，趙良弼等，前往交涉，然往返數次，終未能如願以償，於是元世祖不能忍耐了，乃決心出兵渡海遠征。其遠征前後兩次，第一次為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三月，由鳳州經路使錫都，連同高麗軍民總管洪茶邱等，率所部將士約三萬人，從合浦攻對馬島，登陸

後，連敗日軍，斬其將允家助圓，日人大恐，悉發其藩屬所有之兵十餘萬人前來抗拒，復屢爲蒙古與高麗的聯合軍所敗，但終因敵衆我寡，主客之勢，又復懸殊，卒於未竟全功之前，自行班師，這是很可慨嘆的。

經過此一戰役後，元室又遣使臣赴日交涉，不意這些使臣，竟爲日人所殺！於是到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二月，又發十萬人大舉東征，以阿剌罕爲主將，范文虎，錫都，洪茶邱副之，所採的進兵途徑，仍然是由合浦攻對馬島，登陸後，聲勢甚爲銳利，日人舉國上下，惶恐莫名，沿海居民，狼狽逃竄，國內謠言四起，幾有立即瓦解的趨勢，可是經過一個短的時間後，元兵忽遭遇到許多的阻折，第一是士兵不服水土。疫癘盛行，死亡相繼；第二是渡海長征，所帶糧食，有匱乏之虞，而就地居民遠避，無從取得接濟；第三是時至八月，風潮洶湧，原所乘去的船隻，多被擊毀。由於這種種困難之不能克服，於是將領的意志不能統一，各圖早日撤回，因此竟爲日本所乘，回師反攻，將士撤退無路，遂悉數死亡，十萬人中，生還者僅數人而已。這是蒙古從成吉思汗以來，歷次對外戰爭中，所從未遭遇過的一次挫敗。後來元室雖仍欲圖進行第三次東征，但以西南方面發生事變，終作罷論，遂讓日本長此猖獗，終元之世，始終未向中國通使，而且其輕視傲慢的態度，亦遂從此增長了。

### 第三節 明代之倭寇

自元代的兩次東征均未獲得成功之後，便引起日本對中國的一種輕視之心理，同時也就種下了後來倭寇侵華的禍根。於是到明代時，中國沿海各省，便普遍地遭受了倭寇極重大的騷擾，尤以江浙閩廣四省爲尤甚。

起先是當元室統治力量已瀕瓦解，而明帝國的基礎尙未穩重的建立以前，倭人即時有向我沿海各地騷擾之博事發生。那些前來騷擾的倭人，並不是什麼正式的軍隊，同時也沒有什麼整個的侵略計劃，完全是一種海盜的性質，趁着中國人不防備時，便狂風暴雨一般的闖上陸地來，施行其殺人放火的手段，擄掠一些東西便逃走，迨至中國官廳正式派遣軍隊到達時，若輩早已揚長而去。這就是明將廖永忠所謂：「其來如奔狼，其去如驚鳥，來或莫之知，去亦不易捕」的情形，而爲當時沿海一帶的居民，所感覺到極爲痛苦而又極不易驅付的一件事。

洪武二年（一三六九）三月，明至第一次派遣使臣，開始向日交涉，但這次交涉不獨未能得到效果，而騷擾的範圍且更爲廣闊，由山東以浸及於江浙兩省，於是至翌年三月，又派萊州同知趙秩前往日本，幾經週折，始晤見日王良懷，曉以中國德威，勸其歸順，但日本終以元師征日舊恨爲言，不肯與明修好，同時誤會到使臣趙秩，即係元室使臣趙良弼

的後裔，欲加殺戮，後由趙袞多方辯白，才改容禮遇，應允向明室奉表稱臣，並派使臣細來隨秩來華入貢，這總算是化險爲夷，很圓滿的解決了。

然而此種圓滿的解決辦法，在事實上可以說是毫無益處，不到老久的時候，倭寇依然故態復萌。到崇禎擾。從洪武七年（一三七四）起以迄於二十三年（一三九〇）止，其騷擾行爲，一直沒有停止過。可是在這期間中，日王仍遣使來朝，進貢方物。其所以形成此畸形狀態者，實由於當時日本政局有以使然。原來當時日本的政治是不統一的，內部分裂爲好幾百個藩國，各藩國均割據稱雄，而中央政權，又完全爲武人控制，這般武人，對內則暴戾專橫，目無法紀，對外則特取一種極偏狹的排外思想，無理橫蠻。致號稱中央政將之最高領袖的天皇，完全成了個空名，好像中國春秋時代的周天子一樣，一點權力也沒有的。在此種情形之下，天皇的權力，便不能施於藩國，而藩國又不能約束人民，於是遂造成如上所述的這樣一個畸形的局面。

和平交涉的手段，既然終不能制止倭寇的侵擾，於是明廷祇得另想其他應付的辦法。所謂其他應付辦法者，當時所採用共有兩種，一是斷絕貿易往來，嚴禁沿海一帶的人民，「下海通番」，（見顧炎武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九十一）。一是整飭軍備，積極防禦，洪武六年（一三七三）採納廖永忠的建議，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無事則沿海巡查，有警則調大船追逐，這是關於水上的戒備。其關於陸地者，則任命湯和

爲沿海經略，專門備倭。湯和所採用的辦法，是於沿海各地，建築衛所，輪流的派兵防守。這些辦法，雖然在事實上曾收到若干俾益，然究以區域遼闊，有顧此失彼之虞，以至終太祖一代，倭寇騷擾之禍，迄未完全斷絕。

成祖以後，日本內部的政局，稍有變動。卽分裂已達六十年的日本皇室，在這個時候統一了，故王權得以稍微加強。永樂初年，日王源道義遣使來朝，並將其所捕獲的擾邊海盜二十餘人，獻與明廷，以表示並無縱容之意。於是明廷，因詔封源道義爲日本國王，並與之約定，以歲十年一貢，但貢使人數，不能超過二百，船隻不能逾兩艘，且朝貢人員，不得攜帶武器。經過這次條約之後，應讓不會再有騷擾的事情了，而事實復不盡然，最初那幾年比較還好，祇有小規模的搶掠，而來的次數也還不多，但到了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以後，便大舉入寇了，然其朝貢的使臣，照例還是來的，因爲他們可以藉此得同一筆豐厚的賞賜。明廷則每當倭使前來時，卽以騷擾之事相責問，若輩輒支吾其詞，說這是一些無賴鼠竊之輩的自由行動，請明廷寬恕其罪。當時明廷方一意懷柔，也祇好馬虎過去，不再追問，可是這樣一來，倭寇的氣焰更爲猖獗，而騷擾的舉動，來得亦更勤密，然而這祇是初期的情形。其更劇烈的時期，則在嘉靖以後。

在前面我已經說過，倭寇在擾華中之所以仍遣使向中國朝貢者，其動機乃在於貪圖賞賜，而嘉靖以後倭寇擾華舉動之所以更爲劇烈，卽是由這賞賜的問題所引起。因爲當時